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面对“主题”，作家何为？

□王 棵

近年来，在国内儿童文学领域，主题类创作与出版备受瞩目，相关讨论也层出不穷。在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大热的时代，被波及的作家应该如何自处？

“背对”主题，放松创作

倘若我们稍作浏览近几年相关部门针对主题创作与出版发布的文件，便会发现，这里的“主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这种宽泛，究竟是理解为“主题创作和出版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还是理解为决策者想用这个概念将更多题材、所有优秀出版者和有才华的作家容纳进去的雄心，到底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政策解读，这本身就是件耐人寻味的事。

据我观察，宽泛之所以形成，跟相关文件中某些规定有较大阐释空间有关。这些可供阐释的空间，构成了通往创作的自由之路，那是对作家来说极宝贵的部分。具体哪些规定属于有阐释空间的部分，专家学者多有梳理和论述，在此我不一一赘述。

有段时间，我喜欢看那些以战争为背景的优秀儿童小说，尤其是奥莱夫的《隔离区来的人》、洛伊丝·劳里的《数星星》、麦克·莫波格的《柑橘与柠檬啊》、凯瑟琳·朗德尔的《骑狼女孩》、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等等，看着看着，我技痒难当，也去写了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声声》。为了鉴定它的文学性，我把小说投给了《作家》杂志，后顺利发表。出版时，这部作品被列为主题出版物。可是，在构思和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从未考虑过把它写成主题出版物，我只想写尽自己的创作能力向此类题材中的经典致敬。不久前，与一位我敬重的作家同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聊到主题创作与出版，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然而，她出版的两部长篇儿童小说，都已成为主题类儿童小说经典。如果把主题创作比作一辆时代列车，自它诞生以来，没想过搭它或对它全无概念却无意间搭上它的作家，究竟有多少？我觉得也许会有很多。要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想可能自己也不会去专门研究相关文件和论述。

言为心声，这是老生常谈的说法。但放在这里却一点不显得过时。是的，既然主题创作这个园地浩大无垠，可以任人抒发心曲，作家何必自筑藩篱、自我捆绑？何不就背对主题，放松创作？倘若碰巧成为主题出版物，那也未必不是一种出版佳话。

多数“主题”，对作家形成多重考验

主题创作所界定的题材，十之七八确实是有边界的，这些题材，通常要求围绕国家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展开创作，而它们恰是整个主题创作版图中的重点区域，是这一版图中的重中之重。在我看来，这些题材，对作家的政治素养、政策解读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尤其是文学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对口帮扶这类存在边界感的题材，在作家介入时看似容易写，但对作家来说其实是更大的挑战，也暗中对作家形成了多重考验。

挑战和考验在于：文学是不应设置边界的，而这类作品设置了边界。这意味着，作家如果没有极强的文学驾驭能力，只能通过牺牲部分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达成其他创作诉求。最坏的结果就是，使作品成为单纯的政策图解，或是成为假文学之名撰写的新闻报道、事迹报告。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作家学养深厚、文学素养极佳，不但不会让文学委曲求全，还能起到令人惊喜的艺术效果。近年来，这两个方面都不乏其例。据我观察，许多作家之所以不敢随便触碰这些题材，是免得自己的创作成为反例。倘若因了某些原因而“加盟”此类创作，这类作家也会想办法体验生活，至少是做足采访，且进入创作后会尽自己身力去写。最好的情况则是：这位作家本身就在这种“边界”的内部生活过，比如，在选题内容所对应的岗位上代职过一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主题创作与出版占比更多。所以，整个主题创作与出版的形态其实主要是由它们塑造的。也因此，这里是主题创作与出版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相关作品的内容过度政治化、人物脸谱化，同类作品的同质化现象，种种弊端，都不乏案例。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儿童文学特有，成人文学也一样。

总之，要实现主题创作与出版的修正和提升，想在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中维护儿童文学的尊严，主要应从被“主题”界定到的这些题材方面着手。

站到更高的支点看“主题”

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火爆，吸引了众多作家和出版者来到这条“赛道”切磋技艺。当有一条“赛道”上高手如云，它必然会比其他“赛道”更易实现出版精品化。这样看来，主题

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近年盛行不衰，是在帮助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更好地实现精品化之路，由此提升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水准。事实正是如此。翻看近年出版的主题类儿童小说，会发现，相较于绝大多数人们印象中那种肤浅的儿童小说，它们更讲究语言、注重结构，思想性、艺术性和内涵方面，更是有明显的跃升。

从这个角度看，当下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之热，是对过去一段时间肤浅化、娱乐化的那类儿童文学作品市场占有率过高的一种纠偏，是对儿童文学的一种摆正。这种纠偏或摆正的由来，时机刚刚好，是与时代发展同频的一种反应。

是的，在更具娱乐功能的影视特别是短视频的冲击下，肤浅的、注重娱乐效果的文学读物不再像它们最辉煌的时期那样被人们所需要，读书成为小众的行为，当一个人鼓起勇气放下遥控器和手机，换一本书在手上，他可能特别需要获取影视、短视频无法给予的滋养。那么，这种滋养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诗意、隽永的文字散发出的特有魅力，是文学艺术优于视听语言的那些部分。往前推十几年，年轻读者捧着青春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现在，他们也开始推崇余华、迟子建、李娟这样的当代作家，未来，也许十分小众的中外文学作家也会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可以说，读者的欣赏水平在日新月异地进行、提高，影视和短视频的主要受众欣赏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近期，具有散文诗气质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广受观众的追捧和赞美，或许就是有力例证。整个社会人们的欣赏水平在进化、提高，孩子们不可能不与时代同频。十年前，我们可能会认为国际大奖中那种连成人都觉得深刻的、具有“大文学”气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只有个别孩子能看懂或喜欢，现在，“个别”说不定变成了“一群”。

绝不是说，浅显的、专注于娱乐功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该有，它们应该有，但目前占比过大，需要减少，而一些思想深刻、充满艺术魅力、彰显文学力量、可读性也强的作品，应该增加。对于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盛行不衰，把头埋进现象的内部去看，易于发现令人遗憾之处。但如果站到更高的支点去看，能令人我们眼帘的，也许只有时代的激流对从业者生命力的更大激活，以及漫长、雄阔的大浪淘沙过程中突然闪现出来的一丝金光。一种事物，在其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无论是深入其中者，还是围观者，都不妨给它点耐心。

(作者系作家、编剧)

■关注

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动因有三项——语言、草原和童年。

把美好的语言送给孩子。1981年，我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迄今已有40多年。吸引我一直往前探索的原因是对汉语的热爱。我母语是蒙古语。儿时，我家里是一个驿站。从北京、呼和浩特返回巴林右旗的亲戚朋友要在我家驻扎几天。他们用蒙古语交流大城市的见闻，让我入迷。我父亲的战友经常来我家吃饭喝酒，用蒙古语高谈阔论，我感到语言可以制造一个世界。

曾祖母努恩吉雅把我同姐姐带大，她用蒙古语讲述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妙不可言，智者巴拉根仓住进了我心里。我父母一辈子都在讲蒙古语。语言的每一个词汇是反射世界的小镜子，我从蒙古语里看到一个辽阔的游牧世界。我从小学学习汉语，23岁用汉语创作诗歌与短篇小说。写作时，两种语言在大脑里切换。写到草原和蒙古族牧民，我脑子里全是蒙古语的语音，好像闻到了牛粪的气味，手里握着喝奶茶的木碗。

两种语言相遇，使我对汉语非常敏感。于我而言，汉语有非凡的喜感。譬如人长鼻子。还有一个词叫门鼻子，人长耳朵，而树上的真菌叫木耳。“打”是个动词，打扑克、打电话、打电、打车、打酱油都跟打无关，而战争却叫打仗。从汉语的特性来看，这是一种欢乐的语言，中国或许应该出现更多善写幽默的作家。古典文学里的汉语幽深、浩茫、凝练，用很少的语言表达很多的意思。比如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脑满肠肥等成语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历史故事。孔子、老子、李商隐的诗文也皆有言外之意，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话里领会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意思。

汉语是博大的文学版图，我选择的汉语之路通向雅致、简洁和生动。我下气力学过汉语古典文学，特别是汉唐文学，汲取营养。在创作中运用自己的语言，摒弃掉书袋，让汉字在我笔下诸如带露的青草，如庄子说的“即雕即琢，复归于朴”。诗人邹静之多年前对我说，语言的高级阶段是用声音写作，我深以为然。汉语每个音节的语音读一篇文章读上去参差错落，朗朗上口，是美好的享受。还记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文学典藏系列鲍尔吉·原野散文选》封面写道：“鲍尔吉·原野的语言功力令人称奇，所选篇目纵横开阔，灵光四现，将细腻豪放，真诚幽默，练熟优美冶于一炉而毫无困难，且诗意斐然。”诚然，我尚未真正实现这番境界，但力求接近，我把它看作是美好汉语的深情反哺。

与汉语相遇是我一生的幸运，里面有收获不尽的幸福。我写儿童文学，意在把美好的汉语送给少年，以自然，以草原，以爱。纯洁的语言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配得上他们美好的心灵。

把远去的草原送给孩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儿童去城里读书，由他们的爷爷奶奶租房陪伴。草原禁牧的政策实施多年，草原上很少再见到羊群和牛群。牧民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游牧文化也将会随之消失，哺育我长大的蒙古传统文化也离蒙古族孩子越来越远。我在城里长大，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了解并不多，没想到，今天的我竟然变成一个讲述蒙古族文化的人。我感到既惶恐，又沉痛。在不远的未来，那些美好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将由谁来讲述？奔驰的马群和牧师的羊群，要到哪里仰望？从小就我知道，用蒙古语命名的山峰和河流都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富裕的山，吉祥的河。小小的泉眼也有一个好名字：长高的泉水，金子的泉水。父母不许我们往河水里扔脏东西，不许往火里吐唾沫，诚实与孝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这些教化伴随民间故事和民歌进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田。以后孩子们到哪里和它们相遇呢？近年间，我出版了《乌兰牧骑的孩子》等13本儿童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有长篇童话，也有桥梁书和绘本，故事的背景都在草原。我用文学的方式，传达草原的气息，传达牧人与牧歌的气息，传达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气息，希望孩子从中看到新时代的内蒙古故事。

把爱放在孩子心底。我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父母都曾参加革命，父亲17岁加入四野内蒙古骑兵，出生入死，转业从事文化工作，是翻译家；母亲13岁加入昭乌达盟文工团，后来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工作勤勤恳恳，感恩新中国照亮了他们的命运。还记得儿时，我和姐姐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国旗下向老师敬礼，从家里的收音机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生活称得上美满幸福。特殊年代来临以后，父母被关押，我和姐姐在家里艰难度命，冬天没有煤生炉子，也没粮食做饭。比及饥饿可怕的是出门，童年的南箭亭子家属院住着几百号人，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不敢走大路，班级里也没人跟我们说话。冬天，寒风从破碎的窗玻璃间灌进来，我和姐姐披着被子坐在炕头度过长夜。庆幸的是，这样的童年记忆没有让我们的心灵蒙尘。父母一直教导我们要做诚实正直的人，改革开放初期，我读到了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契诃夫等的作品，领悟到爱有力量，爱是不竭的源泉，爱可以引领苦难者摆脱恨的桎梏。

时过境迁，我早已原谅童年。如今，我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写的是爱、友善和包容，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大自然的万物相互凝视、相互倾听、相互依存。我希望孩子们长大了保持同情心，以爱的目光注视一切。把美好的语言送给孩子，把纸上的草原送给孩子，把爱传达给孩子，无论做到了哪一点，都称得上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高光时刻。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以自然，以草原，以爱，把美好的语言送给少年

□鲍尔吉·原野

“一不真实就假了，一假就不感人了”

□张玉清

说到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要坚持真实的原则，这两年我也写了两本主题写作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有几点个人体会，略谈一谈，就教于方家。

主题写作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写英雄、写模范、写榜样，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就要虚构一些细节或情节，我在写作中体会到在虚构这些细节和情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它的真实性。因为真实才有力量，只有真实了，才能加强你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力量。我举个例子，在一本写英雄的书里，作者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某个大企业在生产中所使用的一个胶垫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个胶垫不是大企业所生产的，是大企业购进的小零件，价值大约在几万块钱。作为总经理的主人公严把质量关，要求销毁这批不合格的胶垫，他带领员工每人手持一把剪刀，当场剪断胶垫。本来写到这里就可以了，表现了主人公质量为生命的企业家精神。但是作者接下来写了一个细节，写有几个女工一边剪着胶垫一边流泪哭泣。这个细节表面上看是烘托出了一种感人的氛围，但实际上它既不真实又不感人，在这个事件中，责任不在女工身上，处罚也不在女工身上，损失也不在女工的身上，而且经济损失也并不大，在这个事件中，女工只是最基层的劳动者，她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剪胶垫的时候哭，事实上，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她们肯定没有哭。这样的细节是禁不住推敲的，乍一看挺感人，但是读者放下书一想，就会发现这其中的漏洞，发现你写的不真实，会连带着把你写的真实的地方也削弱了。本来挺感人的一个事件，结果你非要把它写得不真实，反而不感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虚构一些不应该存在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还是在本书里，作者写到主人公背着在实验室里才用到的器材，到西北大戈壁去做试验，但是在戈壁所做的实验都是利用大自然气候的室外试验，根本用不着实验室里的器材，那为什么还要背着实验室的器材去呢？作者

的目的无非是想用背着器材来强调主人公的辛苦，却没有注意到完全背离了现实中的真实。

一不真实就假了，一假就不感人了，我觉得写主题出版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出于烘托渲染的目的，把真实的写假了，这太得不偿失了。

还有一点就是，在从表扬的角度写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要有更全面的和公允的态度，比如有一部作品，写一个主人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人下海创业的大环境下，主人公不为所动，踏踏实实做地工作，踏踏实实做地学习，向自己心中的理想事业一步步迈进，这样以表扬的角度来写主人公当然是对的。但是作者所写出的语气当中，却含着对那些下海创业的人员的鄙薄和贬低，这个态度就不对了，不要忘了，当初下海创业是国家所大力倡导的。

每一个取得杰出成就的人，都会有高于平常人的地方，尤其是在勤奋和努力的品质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经常顾不得吃饭，会经常工作到深夜，会经常顾不上家，会经常一碗泡面打发自己又投入到工作当中，久而久之落下胃病。这些从正面来表现都没有问题，都是应当的。但在写作当中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思维习惯里，凡事总要得家，不要在表现这样的情节和细节的时候，把不屑的眼光瞄向正常吃饭睡觉工作的人们，写到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语气，不要顾此失彼。并且要从逻辑上思考，先从小逻辑上思考，再从大逻辑上思考。女工的气，在小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而鄙薄下海创业的人，则在大逻辑上不应该。

我个人的体会是，要想写得真实，就要多想，多思考，多包容，尽可能全面地看待问题，还要多读资料，要尽可能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要通过资料来判断佐证，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把人物、事实写得合理，那当然就不真实了。

为了写一本红岩故事，动笔之前，我阅读了20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烈士传记、革命回忆录

以及各类相关档案。因为首先要对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革命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体会众多的革命烈士和英雄志士所做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的深刻意义。

这是工作量很大的阅读过程，因为当初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回忆记录过程中的误差，很多材料需要反复阅读、分析、对比、互相佐证，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当初的实际情况——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创作的作品体裁属于纪实文学，我认为首先一定要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因为所写的是真人真事，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真实的英雄人物，只有真实才有力量。也只有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才是不辜负不愧对我们所敬仰的烈士和英雄志士。其次是故事性和可读性，这要求在素材的取舍上下功夫，分析和捋清思路，选择最能体现红岩精神的烈士和英雄人物来写。

在写作中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烈士和英雄志士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并且在许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曾有充分的表现，这就需要他们在事迹里选取最有力量、最感人的一些细节来写，尽量避免与已有的文学作品过多的重复。比如写到江姐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江姐问她的好朋友：“你说两岁的孩子记得父母吗？”这是江姐在心目中最悲痛的时刻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凝聚着她作为母亲对两岁幼儿最深厚的母爱，凝聚着她作为妻子对刚刚牺牲的丈夫最深挚的感情，更凝聚着她内心深处勇于牺牲为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我在大量资料里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热泪盈眶，在作品中写到这句话的时候又一次眼含热泪，我相信当读者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同样会有更多的人为之落泪动容。

在大量的资料中，找到要表现的人物最真实感人的地方，在读者已有的了解的基础上，让人物更加真实，更加丰富，这才是我这次写作的意义。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本期发表王棵、张玉清两位作家的文章。

王棵结合自己近年来的创作和阅读，谈论了写作者与“主题”之间的多重关系。文章论及的“背对”主题，放松创作“多数”主题，对作家形成多重考验”“站到更高的支点看”主题”等话题，既联系创作，有的放矢，又体察入微，引人思索。

玉清的文章也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篇幅不大，却包含了写作者许多细致入微的心得、体验。例如作者结合实例，强调真实性的重要，认为“一不真实就假了，一假就不感人了，我觉得写主题出版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出于烘托渲染的目的，把真实的写假了，这大得不偿失了”；“从表扬的角度写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要有更全面的和公允的态度”；“在大量的资料中，找到要表现的人物最真实最感人的地方”。

两篇文章都传递了创作者的智慧、经验和责任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琢磨和思考。

——方卫平

